

← (上接 14 版)

“前”“后”之别那么突出,但是自从墨菲自作主张地开始在建筑山面开门后,“前”与“后”反而更加悬殊了。如果运用于拉丁十字平面上,毋庸置疑,将会是接近门(从而远离祭台)者为卑,而反之为尊。两者之间的距离会比中式的用法中体现的还要大。

但在削弱尊卑差异而体现平等性的同时,正如万神庙和祈年殿所暗示的,中心对称平面或攒尖顶的方向性又是最强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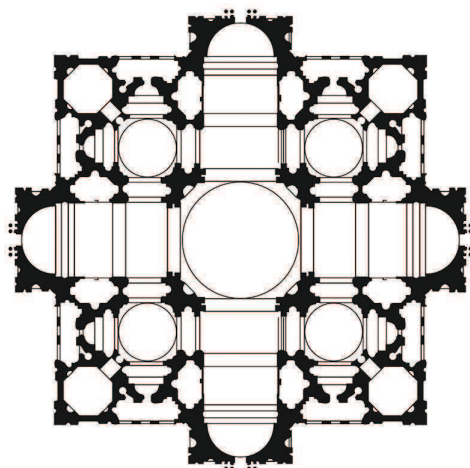
长宽不等的矩形平面有轴线,即正脊的垂直线(与山面平行),但这一轴线的方向是人为规定的、是有限的而有终点的,其终点又是无法从建筑中直接望见的。

而攒尖顶可以被想象为庑殿顶的正脊无限缩小而至于零。这时,平面内的轴线失去了意义,最核心、最明确的轴线变成了由下而上直线,方向不言而喻:自地至天。这时,地平面上的轴线和等级差别都失去了意义,整个空间只有一个焦点,那就是屋顶的中心(对应宝顶/塔刹)。

我们知道,每一个包含宣讲功能的厅堂空间都需要一个功能上的焦点,也即宣讲者所在的讲台。这个焦点和所有观众在功能上是不平等的,然而在意义上又是平等的。这是希腊十字平面从帕拉蒙特至米开朗琪罗的圣彼得大教堂开始试图解决的神学问题,而加上了中式攒尖顶的构思后,这一解决方案更加成熟了(刘丹枫等:《中山纪念堂:一座中国固有式建筑的重读与解析》,《南方建筑》,2016年第5期,第102—109页)。

此外,我还想从另两个易被忽略的角度对这一造型得以生成的可能原因稍作讨论。

其一是故宫建筑对吕彦直的影响。故宫御花园千秋亭、万春亭的造型同样是上半部分攒尖,下半部分为四面出抱厦的曲尺形平面,其造型母题似与礼堂略似(李静:《故宫御花园万春亭的结构和构造》,中国风景园林学会:《中国风景园林学会2011年会论文集(上册)》,中国风景园林学会,2011年7月)。吕彦直的父亲吕增祥先生是清廷官员,系李鸿章麾下“三循吏”之一,也是严复的好友(卢洁峰:《中国近代杰出建筑师吕彦直生平揭秘》,《环球人物》,2008年第16期)。另外,据载在墨菲事务所实习期间,吕彦直曾受命整理故宫建筑资料(或许是为墨菲设计传统样式的中国校园建



帕拉蒙特(Bramante)的圣彼得大教堂平面方案,1506



故宫千秋亭。万春亭和千秋亭为一对造型、构造均相同的建筑,仅藻井彩画有细微差别。

筑作为参考)(吴迪:《吕彦直对近代中国建筑的贡献及影响》,《兰台世界》,2013年第34期,第140—141页)。因此,这一礼堂的造型是否可能受到了千秋亭等亭阁建筑的启发?

其二,两个世纪以来,外国人对中国的塔与亭的符号特别感兴趣。18世纪的佚名法国传教士的《论中国建筑》(Essai sur l'Architecture chinoise)(佚名著,范冬阳译:

《藏在木头里的灵魂》,北京时代华文书局2017年版)画的最多的就是塔和亭子,其中甚至不乏出于臆想、相当荒唐的作品。同期来华的威廉·钱伯斯著《论东方园林》(“Dissertation on Oriental Gardening”,见 Designs of Chinese buildings, furniture, dresses, machines, and utensils: to which is annexed a description of their temples, houses, gardens, et cetera),同样

集中描绘了中国的塔(John Summerson. Architecture in Britain, 1530 to 1830. Pelican History of Art. Harmondsworth: Penguin Books, 1970),他回国后还在英国以不那么准确的比例在邱园(The Royal Botanic Gardens, Kew)重现了中国塔,后被慕尼黑的英国花园(Englischen Garten)仿效。进入20世纪,外国人对中国塔与亭的兴趣不减,例如曾任燕京大学教授的西德尼·甘博在影集里记录了大量京郊的塔的影像资料(邢文军、陈树君编著:《风雨如磐:西德尼·D·甘博的中国影像》,长江文艺出版社2015年版),而村田治郎对居庸关过街塔首作科学研究。很多外国人把攒尖顶的建筑即亭和塔作为中国建筑的标志性符号(例如在中山陵的投标中,戈登士达以五重八角塔作为方案),这会不会左右了墨菲事务所对建筑造型的选择?

尺度与跨度

如同所有西方的现代建筑师事务所一样,墨菲事务所制作的方案图是很符合画法几何的。这给予我们以通过他的图纸试图复原建筑尺度,进而推断其跨度的条件。

现在建成的德、才、均、备斋,正脊长约为47.5米。在图中,为礼堂同方向上上层通面阔(等于通深及通径)之2.2倍,则上层通面阔约为21.6米;同理推算知,下层通面阔(等于通深)约为43.3米,台基通面阔约52.9米,通深约51.2米。广州中山纪念堂未设置传统台基,而前两个数据分别为40米和81米,

各为两倍左右(建筑文化考察组:《中山纪念建筑》,天津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

中山纪念堂室内会堂直径71米,据此估算,如燕园礼堂建成,室内礼堂直径大约在38米左右,桁架跨度则更大,在钢材很难自产且价格昂贵的民国时代,其造价无疑将会是惊人的。以纪念堂造价928085两银子的1/8计,数目也在11万以上。另外,中山纪念堂可容纳5000人左右,据此推算,礼堂若建成可容纳一千余人,作为对照,王府井教堂仅可容纳八百余人。

未建成的殿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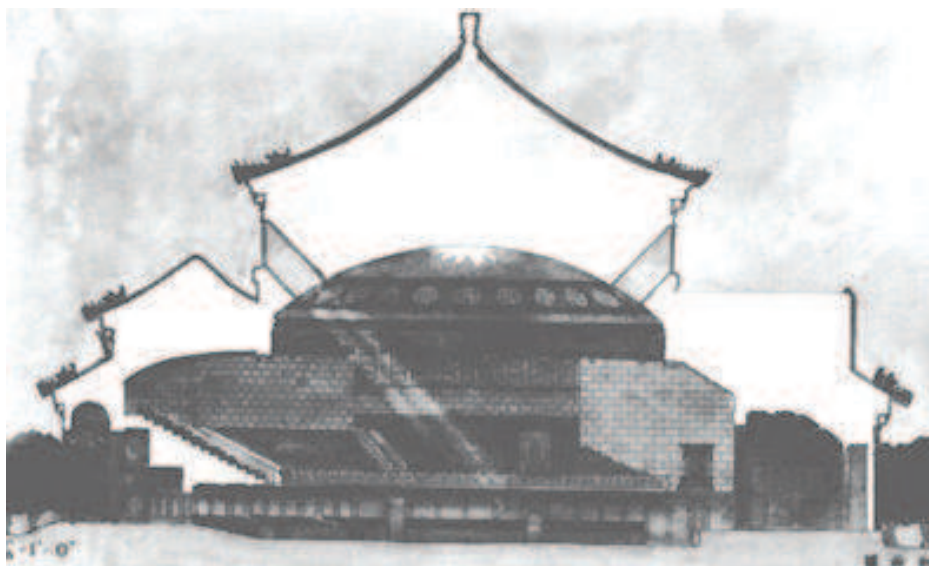
事与愿违,这座本拟作为燕园建筑群中心建筑的礼堂最后并未建成。今日,燕园的“礼仪中心”乃是办公楼,而视觉焦点则无疑是未名湖畔仿通州燃灯塔而建的博雅塔。一个视觉和功能的双重核心从未被建立起来。

但是这座建筑却并未像一些学者推论的那样,从燕园中彻底遁形——这种推论大抵来源于一种地图层面的判断,因为那片地块最终被小山坡和绿化取代了,而武断地认为这个建筑就从图纸中被删除了——这座建筑不仅在燕园中能找到遗留,也长久地影响了此后中国的仪式空间形态。

岛亭是礼堂最直接的哲嗣。这座半封闭的八角亭阁与环境不成比例的体量、与柱高不成比例的屋顶高度,都能从礼堂中找到依据。毋宁说,岛亭是只剩上半部分的微缩版礼堂。在空间组织和实际用途的方面,礼堂都得到了部分继承。岛亭在燕大时期成为公共生活的核心空间之一——师生休憩时会前往的茶室,而北大时期在经过修缮后成为了会议室。岛亭的围廊之所以被围挡了一半,是因为它会被用作准备区或后台:这种分割即使不合理,也仍是礼堂重视焦点、方向而忽视前后、尊卑这一思路的延续。

更深远的影响,待6年后吕彦直携将其改进而得出的中山纪念堂一举夺标之后,才得以渐渐显现。这种用平等的形态隐秘包装的仪式化空间,不仅在全国范围内产生影响,而且至今还被我们切身感受到。

(作者单位: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



吕彦直的广州中山纪念堂设计方案剖面图,1926